

***Religion,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the Modern Era: The Dao among the Miao?* By PAUL R. KATZ. New York : Routledge, 2021. 239pp.**

Paul R. Katz (康豹) 撰寫的 *Religion,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the Modern Era: The Dao among the Miao* (《苗可道非常道：近代湘西的宗教、種族與性別》) 一書通過在中國湘西(全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對漢族、苗族和土家族進行田野調查,結合文獻材料,以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對苗族社會4類儀式專家進行討論,描繪出湘西社會中儀式力量和國家參與的過程。同時,康豹以對湘西跳香節(The Incense Dancing Festival)的討論與還儺願儀式(Repaying a Nuo Vow)的田野調查,歸納出苗族社會中的「道」,這裡的「道」是苗巫文化與道教文化之間相互滲透、融匯、吸收,以及重組的產物。

康豹的研究材料之一為地方檔案和圖書館的資料,他梳理國家對湘西的治理過程,所處理的時間段為公元前14年到公元前49年的帝王時期、施行土司制度的明清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以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同時,他在2010—2016年在湘西進行實地的田野工作,對近年來湘西人到沿海打工的狀況進行討論,對疫情的影響也有涉及,是時間跨度相對完整的研究。

該著作加上結論共有8個章節,大致可分為4個部份。第一部份介紹研究背景(第一章和第二章):描繪湘西的地理環境、人口與社會結構、歷史、社會經濟條件、文化特徵、國家參與治理的過程、神秘的趕屍和蠱毒的圖景,以及通過寺廟的歷史研究和田野調查數據,討論寺廟祭祀在湘西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部份是討論研究材料和對象(第三章),通過對64位儀式專家在不同日常活動中的訪談,介紹其家族傳承的傳統、民族服飾的認同,以及儀式的結構特點。在所有的苗族儀式中,最重要的儀式是祖先的祭奠,同時還有椎牛、椎豬、接龍和祭雷神的祭儀。第三部份是探究國家權力和仙娘(female mediums)之間的關係(第四章和第五章),討論西南地區和非西南地區國家權力和司法連續性。不論是苗族的血誓之盟、雲南佤族的剽牛習慣法、廣西瑤族的村規民約,抑或是海外非漢人的司法儀式,都是這一觀點的體現。康豹在第五章討論20世紀40年代初的跳仙起義,說明仙娘和儀式阻力的文化滲透過程。第四部分通過具體的案例討論跳香節和還儺願的儀式

文化（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六章是介紹跳香節，通過對瀘溪縣跳香節的儀式過程進行個案研究，討論歷史發展的可能起源和模式，以及該節日所受到的現代衝擊；第七章是探討還儺願儀式的文化意義，總結其歷史來源、地區流行和文化核心，探討苗族文化互動的「道」。

康豹在該著作中討論了4個問題：第一，非漢族儀式傳統和道教等有組織的宗教之間的互動過程中發生哪些歷史變化？在開篇中，康豹介紹關於太上老君3個弟子的傳說故事，以回應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在湘西，道教文化與非漢族儀式傳統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康豹認為，湘西文化取決於特定地區的當地文化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漢人的信仰和實踐所塑造，同時，它也反過來作用於國家和社會的型態塑造（頁229）。

第二，性別和種族等因素如何影響這個過程的形成？在儀式專家的探討中，仙娘的特殊地位不容忽視。在苗族近代社會20世紀40年代早期的跳仙起義中，仙娘在反抗國家權威的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康豹認為，結合苗族社會仙娘的研究和其他非漢族社會女性靈媒力量的探討，表明在許多非漢族地區中，儀式的合法性並非基於所謂的「儒家」父權制觀念，而是以性別和權力觀點為特徵的實踐（頁107）。

第三，湘西與中國西南其他地區有什麼共同點和不同點？康豹認為不能用「單一學科的方法和理論」看待這一問題，而應該將政治與文化政策，還有社會歷史等綜合因素考慮進去，進行全面的思考（頁231）。

第四，通過這些現象的研究，可以了解現代中國歷史上的哪些重大問題？（頁2）跳香節和還儺願儀式的研究回答了康豹所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即包括政黨對地方幹部培訓的職責、國民黨的活動、「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行爲、「無形文化遺產」對旅遊業的促進、文化政策的施行等在內的重大問題，都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因素。

該著作的研究結果說明，還儺願儀式並非來自湘西，而是漢族和苗族傳統的結合，並且至今流行在苗族、土家族和漢人社會中。最重要的是，透過儀式，我們可以看到還儺願的核心其實是對於生育率低和亂倫婚姻的擔憂（頁205）。康豹認為，還儺願的亂倫傳說是漢族與苗族文化互動的結果，儀式中祭壇的擺放方式展現道教文化對苗族文化的影響，儀式過程裡體現出的個人完整性是履行對神的誓言，這在中國傳統宗教中是非常重要的特徵。因此，還儺願不是單一的原生態苗巫文化，而是苗巫文化與道教、佛教文化互相滲透、融匯、吸收，以及重組的產物。

該著作基本回應了康豹所提出的4個問題，對於湘西與道教文化之間的跨雜糅 (trans-hybridity) 討論具有深遠的意義。康豹結合歷史文獻與長期的田野調查，勾勒出湘西社會與道教文化之間密切互動的圖景，以歷時性的視角囊括兩千餘年的變遷，展現研究者不凡的功力，難能可貴。但是，對於跳香節和還儺願儀式的共時性研究仍有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空間。

一方面是對儀式專家譜系與傳承討論的拓展（高雅寧，〈論湘西苗族宗教儀式中性別與族群之「跨」/「轉譯」實踐〉，《臺灣人類學刊》，2023年，第1期，頁182）。在康豹的討論中，湘西儀式專家與道教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被漢人的信仰和實踐所塑造，既有自稱為苗族又講苗族語的儀式專家選擇使用中文書寫的非當地文本，也有堅持完全遵守傳統儀式形式的其他儀式專家。康豹將湘西的儀式專家分成4類：道士、苗師父、客師父，以及仙娘，他採訪了64名男性和女性儀式專家，對儀式專家的討論涉及家族傳統、服飾認同，以及儀式的結構與執行，實屬珍貴的材料。但是，康豹並沒有對其分類方式進行系統的說明，更值得進一步確認的是，康豹所使用的方式是基於哪個村落的分類？在同一地區的不同縣市，甚至是不同村落，是否使用統一的儀式專家分類方式？這是值得商榷的。與此同時，康豹沒有對這64位儀式專家進行個案的探討，也沒有對其傳承譜系進行說明，是相對可惜的。誠如高雅寧所寫：「建議作者針對儀式專家師承類型，與其家族聯姻關係等項目資訊較多的個案進行爬梳，能更清楚呈現婚姻法則與實踐落差下儀式知識傳承與展演的轉變」（高雅寧，〈論湘西苗族宗教儀式中性別與族群之「跨」/「轉譯」實踐〉，頁181），令研究成果更加豐富且生動。

另一方面是對湘西不同地區同一儀式異同的探討。在康豹的研究地圖中，湘西西鄰魯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地理位置包含了8個縣市：吉首市（原洽州），保靖縣，鳳凰縣，古丈縣，花垣縣，龍山縣，瀘溪縣，以及永順縣。康豹紀錄了瀘溪縣的還儺願儀式，從3個面向詮釋還儺願儀式所表現出來的文化互動，即還儺願的來源、流行以及核心。康豹認為，釐清這項儀式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產生演變，是探討湘西文化歷史與外來宗教之間互動的重要過程，這個過程與洪水神化、婚姻亂倫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康豹提出儀式的變遷與漢族文化的交融以及佛道文化的影響息息相關，同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推廣和旅遊的開發給當地帶來了挑戰和機遇。但是，筆者所疑慮的是，瀘溪縣位於湘西的東南邊陲，是否能夠代表整個湘西還儺願儀式？其中土家族、苗族，以及漢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否體現在不同

地區的儀式之中？即使在同一地區和同一族群，儀式是否會因所觸及的不同文化以及政策而有細微的差異？儀式的執行是否會因儀式專家的差異而有所區別？這些均是值得更進一步深究的議題。

康豹對湘西的興趣源於凌純聲與芮逸夫在1947年所發表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該報告為康豹的田野調查打下基礎。凌純聲與芮逸夫將苗族的儀式進行分類，為外來的客教儀式與本土的苗教儀式，還雛願儀式被歸類為外來的客教儀式（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128）。康豹在此基礎上提出還雛願儀式是漢族和苗族傳統的結合，並且至今流行在苗族、土家族，以及漢人的社會中，是對苗族儀式與道教文化融合的進一步研究。伴隨着康豹著作的出版，以「跨雜糅性」的視角理解地方信仰的存續和演變，對於西南的儀式研究有深遠的意義，希望有更多關於西南的儀式研究可以更進一步推進這一概念。

臺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民族系
鄭涵

***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 Transitions in Elder Care.* By ROSE K. KEIMIG.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21. 208 pp.**

年歲增長(aging)與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之間的關係被納入現代化探討語境中展開，老年人喪失權力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沈奕斐，〈「後父權制時代」的中國：城市家庭內部權力關係變遷與社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43—50），而這種權力喪失則被視作現代化的結果(D. O Cowgill,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 Theory,” in *Dimensions of Aging*, eds. J. Hendricks and C. D. Hendricks. Cambridge: Winthrop, 1979, 54-68)；現代化「抹黑」(tarnish)了老年人的形象，並降低了老年人的社會地位(Nelson Chow and Xue Bai,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Older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Image and Statu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4 (2011): 800-815)。老齡化研究脈絡下，過往研究多塑造老年人的被動形象，描述他們無法接受自身無為的狀態，極端者甚或走向自殺（劉燕舞，〈農村家庭養老之殤：農村老年人自殺的視角〉，《武